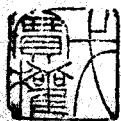


施耐庵新正

戈宝权题



学林出版社



责任编辑: 任祥熊

封面设计: 陆金根

施耐庵新证

曹晋杰 朱步楼 著

学林出版社代理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代理发行 武进文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 插页 1 字数 82,000

1986年11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00

书号 10259·011 定价 0.67元

序

中国古代的小说家、戏曲家多数是不幸的。在封建传统偏见流行的社会里，生前，他们被视为稗官优养之流，备受压抑，命途多蹇；死后，他们又犹如殒星之消失，史志不载，祖谱讳录，历久而湮没无闻。这在世界文学史上是少见的。但是，中国古代的小说家、戏曲家如果地下有知，又应当是感到欣慰的。因为他们贡献于社会的优秀作品，已成为全民族的精神财富。它们不但激动着不同时代的亿万读者的心灵，促使人们去揭示这些作品的艺术奥秘，而且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文人去爬罗剔抉。勾沉索隐，企图整理出作者的生平本末和思想面貌，使之彰显于世或作为研究他们的作品的重要的资料。这种工作，发轫于元代的锺嗣成，继续于明清的贾仲明、郎瑛、胡应麟、姚燮等诸家，而恢弘光大于“五四”以来的专家学者。六百年迄今，已由点滴记述，发展到专论、专著连篇累牍，成为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一项专门学问，一个重要分支，这在世界文学史上虽非独秀，但却源远流长，并具有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

当然，人世间的事物是复杂的，其发展是不平衡的，甚至是曲折反复的。几百年以来，对古代小说家、戏曲家生平的探索和研究，有的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的进展甚微。有的聚讼纷纭，有的不断发现新的材料，向人们提出了新的课题。这其

中关于《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的研究，就是进展甚微而又聚讼纷纭的复杂的一个。自明后期高儒的《百川书志》最早记述《水浒传》为“施耐庵集撰”之后，延及本世纪二十年代初，三百八十年间有关施耐庵生平事迹的第一手材料一无所见；二十年代末揭诸报端的《施耐庵世籍考》未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五十年代初发表的《施耐庵生平调查报告》学术界长期存疑，置而不论；八十年代初新发现的一批施氏家族的文物史料一经披露，立即引起了研究者极大的兴趣。但肯定者言之凿凿，否定者视之渺渺，一时成为争论不休的热题。

我与许多喜爱《水浒》的读者、研究者一样，曾经怀有这种心情：希望能发掘出确凿可靠的文物史料，以证明施耐庵确有其人，并使我们了解其生平事迹的真正面貌。但是，当现有的材料不足以满足我的希望时，我也并未产生什么失望的怅惘之感。因为某种希望虽然可以成为科学研究的目的，但科学研究的结论却是要以事实为依据。没有坚实可靠的事实而去做出满足某种希望的判断，那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1982年湖北省《水浒》研究会的学术年会上，我在发言中谈了这样的看法：江苏省主要是大丰、兴化两地的同志，他们辛勤工作，搜集、发掘出了一批施氏家族文物史料，如果这些材料确能证明《水浒》的作者施耐庵与今天大丰施氏家族的鼻祖施彦端为同一人，那将是对《水浒》研究工作的一大贡献，理应得到人们的感谢；如果这些材料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可以预断在今后也没有再发掘出确凿材料的希望，使研究者认识到应当就此止步，不再把宝贵的光阴和精力化费在这个问题上，那么，他们的工作同样也是值得肯定的。总之，不管结论怎样，这些同志的辛勤劳动对《水浒》的学术研究的发展都是有意义的。现

在我仍然持有这个看法。

曹晋杰、朱步楼两同志是前几年最早发现和考察施氏文物史料的人员之一。几年来，他们不仅到大丰、兴化作了实地探访、考察，向学术界介绍了新发现的施氏文物史料的情况，而且还写出了一批学术论文，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我对晋杰、步楼两同志从事这项工作蕴含的意义，已在前面表明了我的看法，而对他们勤奋、认真的治学态度，我也是非常感佩的。但是，在这篇序文里我要谈的还有另外的一点想法，即如何对待不同学术观点的问题。

在欧美国家流行一句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发表自己的观点的权利。在我们的国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是党制定的促进科学和艺术发展、繁荣的正确方针。我们的方针的内涵比前一句话当然要丰富深厚得多，但鼓励和尊重发表不同的观点，这是两者的共同点。我觉得当前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践上如何正确对待不同的学术观点，仍然是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我们的国家具有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历史，一向是罢黜百家独尊一言的。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特别是“四人帮”的肆意破坏，党的“双百”方针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虽然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学术研究出现了新的局面，但“左”的遗毒依然存在。许多同志就是听不大进不同的学术观点，看不大惯不同看法争鸣论辩的局面，总觉得“舆论一律”才是正常的现象，心平气和公开指名道姓地进行批评和反批评更是少见。这种状况不改变，双百方针就落不到实处，是极不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繁荣的。我与晋杰同志相识以来，建立了学术上的友谊。尽管他与其他同志关于

施彦端即施耐庵的看法还未被我接受，他的关于将施耐庵的传说与历史记载相印证的研究方法也许不无可商榷之处，但这完全不妨碍我们学术观点上的相互交流和尊重。贯彻和落实党的双百方针，依靠的是千百万人的努力。我们两人都清楚，我们只不过是普通的学术研究人员，在群星繁密的学术研究银河中，有之不为多，无之不显少。以二人之微，对形成良好的百家争鸣的学术风气，何足道哉！但是，我们的信念和态度是真诚的。晋杰、步楼两同志的学术论文即将结集出版，嘱我为序。一则有所属望，一则应命而为，这就表明了上述我们的信念和态度。是为序。

李永祐

一九八五年七月五日夜

于中国人民大学静园楼

目 录

序	1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真伪辨	1
一、除施耐庵之外《水浒传》作者诸说之质疑	1
二、《水浒传》为施耐庵所作应属可信	6
白驹场发现之施耐庵史料文物考析	12
一、施耐庵史料、文物发现之经过	12
二、施耐庵史料文物之探考	15
《施耐庵墓志》为近人伪托续考	23
《耐庵墓志》及其以讹传讹	23
《耐庵墓志》与《耐庵小史》均属托名伪作	28
《施氏宗祠木榜文》为今人伪作	32
关于施耐庵生平的调查资料概述	37
一、施耐庵家世	37
二、施耐庵生平	41
三、施耐庵创作《水浒传》的有关资料和轶闻	55
《水浒传》与张士诚起义	66
施耐庵民间传说溯源	80
附录：施耐庵与《水浒》	96
施耐庵与罗贯中	105
后记	115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真伪辨

作为世界文学名著之一的《水浒传》，究竟作者为谁？是不是施耐庵？几百年来，众说纷纭，迄今尚无定论。为了作深入一步探讨，笔者查阅了明清以来、直至五四前后一百多位文人学者关于《水浒传》作者的记载和推断，加以综合分析研究，认为《水浒传》之著作权，无疑地应归之于施耐庵名下，施耐庵实有其人，并非子虚乌有。

一、除施耐庵之外《水浒传》作者诸说之质疑

明、清以来，文人学者对《水浒传》作者的说法不一，除施耐庵以外，还有罗贯中说，施惠说，郭勋托名说，宋人说，等。这些说法，经认真分析研究，均难成立。

（一）罗贯中说。这个说法，始于明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汪道昆，他在托名“天都外臣”的《水浒传叙》中，说：“故老传闻：洪武初，越人罗氏，恢谐多智，为此书，共一百回，各以妖异之语引于其首，以为之艳。”郎瑛的《七修类稿》写于嘉靖四十五年，又进了一步，丢了“故老传闻”，说：“史称宋江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莫抗，而侯蒙举讨方腊，周公谨（密）载其名，赞于《癸辛杂识》，罗贯中衍为小说，有‘替天行道’之言”。嘉靖五年进士王圻在《续文献通考》卷一七七中，说得更直接些：“水

浒传》罗贯著。贯字贯中，杭州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袁无涯《忠义水浒全书发凡》、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许自昌《樗斋漫录》卷六、陈氏尺蠖斋《评释东西两晋演义序》、江念祖《陈章侯水浒传叶子引》，均持罗作说，田汝成、许自昌还说罗是钱塘人，南宋遗民。

清初藏书家钱曾（遵王）在《也是园书目》卷十，记载了“旧本罗贯中水浒传二十卷”。而嘉靖人李开先《词谑》中也记载有“熊南沙、唐荆川、王遵岩、陈后冈谓《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无有一事而二十册者。”熊南沙、陈后冈为嘉靖八年进士，唐荆川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王遵岩为嘉靖五年进士，可算是真人实事，于是有些人就断定《古本水浒》为罗作。吴道新《文论》、顾苓《塔影园集》卷四、刘晚荣《水浒全图序》均持此说。

特别是郑振铎等影写了天一阁旧藏明兰格抄本无名氏（贾仲明）《录鬼簿续编》，中有“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后六十余年，竟不知所终。”贾仲明约生于至正二年，他在永乐二十年为钟嗣成的《录鬼簿》题跋，署“八十云水翁”可证，既然贾仲明至正二十四年还见过罗，证明罗确有其人，于是罗作说进一步肯定下来了。鲁迅、俞平伯推断：简本在先为罗作，繁本乃施编。

其实，罗作说只是一种假设：第一，贾仲明的《录鬼簿续编》，只是说罗为一文人，下面列举了罗所作杂剧三种（《宋太祖龙虎风云会》，《三平章死哭蜚虎子》、《忠正孝子连环谏》），并未说他写《水浒》。第二，汪道昆所刻水浒传，明题着“施耐

庵集撰，罗贯中纂修”，与他所说《水浒传》作者为“越人罗氏”，本身也自相矛盾，而且他自称“故老传闻”，并无定论。第三，郎瑛的《七修类稿》在紧接着说了“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之后，立刻又自己否定，说他曾见一本，刻明是“钱塘施耐庵的本”。第四，据戴不凡同志考证，钱曾《也是园书目》所说“旧本罗贯中《水浒》二十卷”，至今未发现全本，即使有，也不一定早于汪道昆刻印本。李开先《词谑》中提到的《水浒》，并未注明写作者。第五，以《三国演义》与《水浒传》比较，也可看出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胡应麟《庄岳委谈》卷下写道：“郎谓此书及《三国》，并罗贯中撰，大谬。”惠康野叟的《识馀》说：“二书浅深工拙，如天壤之悬，诟有出一手理？”所以，《水浒传》为罗作说难以成立。至于罗续说，下面还要谈到，这里不赘述。

（二）施惠说。始见明人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宋江”条：“征辽、征腊，后人增入，不尽君美也。即君美之传《水浒》，意欲供人说唱，耸人观听也，原非欲传信作也。”

清人有论及施惠者，则又把他和施耐庵混为一人了。程穆衡《水浒传注略》说，“不知耐庵何名字，宋、元人书俱无载者，唯考元人钟嗣成《录鬼簿》有施惠字君美，巨目美髯，好谈笑……嗣成，宋末元初人，而与君美游，或即其人未可知。”无名氏《传奇汇考标目》说：“施耐庵，名惠，字君承，杭州人，（著有）拜月亭旦、芙蓉城、周小郎月夜戏小乔。”前者是推测，后者是臆断，且程说是宋末元初人，当时长篇宏著《水浒传》尚未问世，焉能论定？钟嗣成的《录鬼簿》，只说“施君承钱塘人，世居吴山，以贾为业。……诗酒之暇，唯以填词和曲为事，所著有《古今砌话》，亦成一集”，与《传奇汇考标目》说他善作剧差不

多，并未涉及《水浒》。而曹棟亭所藏钟嗣成的《录鬼簿》还说：“施惠，一云姓沈。惠字君美，杭州人。两者不全一致。”

近人吴梅《顾曲麈谈》说：“《幽闺记》为施君美作，君美名惠，即作《水浒传》之耐庵居士也。”蒋瑞藻《小说考证》卷三引《怀香阁闲话》说：“《元宵闹》杂剧，无名氏撰，衍施君美《水浒传》卢俊义事。”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六《说公案》第三《水浒传》：“耐庵即施惠号，见传钞本宝敦楼《传奇汇考目》。”王利器先生在1982年第三期《文学评论》上，发表了“《水浒传全传》是怎样纂修的？”一文，亦赞同施耐庵就是施惠之说。实际上，吴梅、蒋瑞藻的说法只是臆断或照抄稗记，并不可信。王利器先生考出《水浒》中有一些浙江方言，并发现施惠的《幽闺记》中有些描写与《水浒传》相似，就论定《水浒传》与《幽闺记》同出一作者之笔，即为施惠之作，也还难以令人信服。

（三）郭勋托名说。明人沈德符《野获编》云：“武定侯郭勋，在世宗朝（即嘉靖）号多文多艺能计数。今新安所刻《水浒传》善本，即其家所传。前有汪太涵序，托名天都外臣者。”这里说的是郭勋刻印《水浒传》。沈国元的《皇明从信录》说：“武定侯郭勋欲进其立功之祖英于太庙，乃仿《三国志演义》及《水浒传》为《国朝英烈记》，言生擒士诚，射友谅，均为其祖，传说宫禁，动人听闻，已乃疏乞祀英庙，……”这里说的是他仿《水浒传》作《国朝英烈记》。而钱希言《戏瑕》卷一则责怪他删《水浒》之过，云：“文侍诏（征明）诸公，暇日喜听人说宋江，先讲摊头半日，功父由及与闻。今坊间刻本，是郭武定删后之书矣。郭固附注大僚，其于词家风马，故奇文悉被划薙，真施氏之罪人矣。而世眼迷离，漫云搜求武定善本，殊可绝倒。”

清人则无一人论及。今人胡适甚至认为连郭勋所刻也是

假托，他在《水浒传新考》中说：“当时武定侯郭勋喜欢刻书，故此本假托为郭家所传，郭勋死于嘉靖二十八年（应为嘉靖三十四年——引者注），也许此刻本出时，他已死了，故容易假托。”戴不凡先生于一九七五年秋，正式提出郭勋托名说，“疑施耐庵即郭勋”，主要论据是：郭刻本才有施耐庵之名。其实，郭刻本之前，已有署名施耐庵之百回本《水浒》行世（高儒《百川书志》），作不了伪，而且郭勋死于嘉靖中，郭本乃其后行世，焉能死后作伪托名？！

（四）宋人说。在明代，有人提出此说。田汝成说：“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西湖游览志余》）。许自昌《樗斋漫录》卷六引钱功甫言曰：“《水浒传》，盛于南宋遗民、杭人罗本贯中”。明起北亦子心汇辑《绣谷春容选镌骚坛摭粹嚼嚼谭苑》“枚集”卷之六亦谓：“钱塘罗贯，南宋时人，编撰《水浒传》。”对这类说法，清人赵茗狂曾列举事实批驳说：“田叔禾说《水浒传》为宋人所作，实属无稽之谈。”（《水浒传》叙）这几人都是说罗贯中是宋人，并未提及施耐庵是宋人。清人程穆衡在《水浒传注略》中，说“（钟）嗣成，宋末元初人，而与（施）君美游”，推测君美就是施耐庵，第一次提出了作《水浒传》之施耐庵可能是宋末元初人。黄霖同志最近又根据《靖康稗史》七种的编者署名“耐庵”，推断这南宋末年的“耐庵”即传《水浒》之施耐庵，且认为施作之《水浒》是简本，并非现在具有文学价值之《水浒》这种说法，至多也只能算是一种推测而已。

此外，还有钟继先说。明人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三：“《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昨于旧书肆中得抄本《录鬼簿》，乃元大梁钟继先作，载宋元传记之名，而于二书之

事尤多。”这里只是说钟继先所作之《录鬼簿》，里面记载了《三国》、《宋江》二书中的事。清人俞樾在《小浮梅闲话》中引用郎瑛这段话时，误解成《水浒传》是钟继先所作，此后便无人提及了。

二、《水浒传》为施耐庵所作应属可信

既然上述诸说皆属推测，施耐庵作《水浒传》是否亦属推测，我以为不然。从明、清以来有关《水浒传》作者的记载来看，大部分评论家都认定施耐庵著，或认为施作罗纂、罗续。

明人高儒于嘉靖十九年写的《百川书志》说，“《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记宋江三十六人之事，并从副百有八人，当世尚之。”这个记载是最早的，比清人钱曾《也是园书目》可靠得多。生于嘉靖年间的胡应麟（元瑞）在《庄岳委谈》（《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中说得更清楚，他说：“然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世率以其凿空无据，要不尽尔耳。”这和高儒所记载基本一致。胡还说：“余偶阅一小说序，称施某尝入市肆，绌阅故书，于敝楮中得宋张叔夜擒贼招语一通，备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润饰成此篇。其门人罗本亦效之为《三国演义》，绝浅陋可嗤也。”和胡元瑞同时代或稍后的刘仕义（《新刊玩易轩新知录》卷十九“处世当知”）、张岱（《陶庵梦忆》卷七“及时雨”）、周晖（《金陵琐事》卷一）、徐树丕（《识小录》）、盛于斯（《休庵影语》卷一“总批水浒传”）均肯定《水浒传》为施耐庵所著。明万历年间权威的《水浒传》研究者李卓吾，他在《忠义水浒传序》中说的，和高儒《百川书志》一致，将施、罗并提，说：“《水浒传》者，发愤之作也。……施、

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在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施、罗二公传《水浒》，而复以忠义名其传焉。”与李同时代或稍后的僧怀林（《水浒一百回文字优劣》）、大涤余人（《刻忠义水浒传源起》）、五湖老人（《忠义水浒传全传序》）、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绿天馆主人（冯梦龙）（《古今小说叙》），还有雁宕山樵（陈忱）（《水浒后传略论》），都同意施作罗纂说。到了明末，金圣叹又提出了施作罗续说。施作说，和施作罗纂说、施作罗续说，都论断作者为施，两说基本一致。上面这些考定施耐庵为《水浒》作者的文人都生于明代，不少是嘉靖间人，那时离元末明初还是很近的，应属可信。

到了清代，施作说则进一步肯定下来。而且对施耐庵作书缘起、写作逸闻及其社会影响，作了更进一步的论述。在作书缘起方面，顺治年间的王望如在《评论出象水浒传总论》中说：“施耐庵著水浒，申明一百八人之罪状，所以责备徽宗、蔡京之暴政也。”光绪年间的王钟麒在《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中说：“施氏少负异才，自少乞老，未获一伸其志，痛社会之黑暗，疾政府之专横也，乃以一己之理想，构成此书。”观鉴我斋在《儿女英雄传序》中说：“施耐庵见元臣之失臣道，予盗贼以愧朝臣，意在教忠，本平治以立言也。”

在写作逸闻方面，光绪年间邱炜蕙在《菽园赘谈》中说：“相传施耐庵撰《水浒》时，凭空画三十六人于壁，老少男女，不一其状，每日对之吮毫，务必刻画尽致，故能一人有一人精神，脉胳贯通，神形俱化。”平步青在《霞外捃屑》卷九“梁山泊”条中说：“水浒所载州县，皆施耐庵弄笔，凭空佐撰，按之宋史地志，率多不合，且有无其地者。阅者不可以为实事，而求其地与其人，以责耐庵之不学也。”

在社会影响方面，光绪年间狄平子在《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中说：“吾昔见日人有著《世界百杰传》者，以施耐庵与释迦、孔子、华盛顿、拿破仑并列，吾骇焉。……继而思之，何骇之有？小说者，实文学之最上乘也。”王钟麒在《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中说：“使施耐庵而生于欧美也，则其人之著作，当于柏拉图、巴枯宁、托尔斯泰、迭盖司诸氏相抗衡。”燕南尚生在《新评水浒传三题》中说：“若以《水浒传》之杀人放火为诲盗，抗官拒捕为无君，吾恐卢梭、孟德斯鸠、华盛顿、黄梨洲诸大名鼎鼎者，皆应死有余辜矣。吾故曰：《水浒传》者，祖国之第一小说也，施耐庵者，世界小说家之鼻祖也。”梁启超《小说丛话》也说：“《水浒》一书，为中国小说中铮铮者，遗武侠之模范，使社会受其余赐，实施耐庵之功也。”

除此之外，肯定作者为施耐庵的还有：康熙年间曹玉珂（《过梁山记》）、王士禛（渔洋）（《居易录》卷七）、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雍正年间勾曲外史（《水浒传序》）、乾隆年间的龚炜（《巢林笔谈》卷一）、嘉庆年间的焦循（《剧说》卷五）、咸丰年间东篱山人（《重刻俞仲华先生荡寇志叙》）、古月老人（《荡寇志序》）、徐佩珂（《荡寇志序》）、光绪年间朱翊清（《谈怪埋忧集》）、颠道人（嵩龄）（《水浒画谱自序》）、耀年（《颠道人水浒传图本纪》）、天南遁叟（王韬）（《第五才子书序》）、李渔（《闲情偶记》卷一）、铁珊（《增订太上感应篇图说》）、林纾（《块肉余生述前编序》）、徐谦（《桂宫梯》卷四）、李焕章（《水浒人传》）、石成金（《天基狂言》）、金植（《巾箱说》）、严复、夏曾佑（《天津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刘玉书（《常谈》卷一）、我佛山人（吴研人）（《杂说·说小说》）、无名氏（《读水浒传书后》）、刘子壮（《宋元春秋》序）、梁玉绳（《瞥记》卷七）、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十八）等。

与此同时,受金圣叹之影响,断为施作罗续者也有之。有的介绍了罗贯中续书的经过,如徐渭仁《徐弼所绘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说:“施耐庵感时政陵夷,作《水浒传》七十回,罗贯中客伪吴,欲讽士诚,续成为百二十回。……当至正失驭,甚于赵宋;士诚跳梁,剧于宋江,……安之非耐庵、贯中教也。”黄人(慕庵)的《小说小话》、延月草堂主人《题抄本水浒卷首》还考证那些为罗续,他们说:“耐庵本书止于三打曾头市,下皆罗贯中所续,今通行本则金采割裂增、减施罗两书首尾成之。”查继佐的《罪惟录》则指出社会影响之大,他说:“自耐庵作《水浒传》,罗贯中续成之,笔墨贻祸者三而未已也。……耐庵、贯中之笔良可畏也。”更多的人则骂罗“续貂”,如忽来道人(俞万春)在《荡寇志开场白》中说,“缘施耐庵先生《水浒传》,并不以宋江为忠义;……乃有罗贯中者,忽撰出一部后《水浒》来,竟说宋江是真忠义。”丘炜萸《菽园赘谈》说:“何物罗贯中强起干预,妄行续貂,七十四回以前被其乱纂者亦复不少,率《水浒》大厄也。”还有李超琼的《柜轩笔记》、俞龙光《荡寇志识语》、半月老人《荡寇志续序》、林昌彝《海天琴思录》,均持施作罗续说。

五四前后,对《水浒》作者的考证,如梁恭辰《劝戒录》、周瘦鹃《水浒传序》、陈独秀《水浒新序》、李逸侯《水浒新序》、眷秋《小说杂评》、朱太忙《标点水浒后传序》、蒋瑞藻《小说考证》等,并没有离开施作说、施作罗纂和施作罗续说,则是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此说的内容。郑振铎在《水浒传的演化》一文中说:“《水浒》的作者最早有高如、李嵩二人,其作品绝不可得见,其后有施耐庵(在元代),其所写著也绝难得到,元末明初,有罗贯中依施氏之作重为编次。”郑在《水浒全传序》中又说:

“施耐庵原本，大致相当于一百回本，减去征辽故事八回之后的九十二回，或一百二十回本减去征辽故事八回和平田虎、王庆故事二十回后的九十二回。原本里面，宋江等受招安以后，只有征方腊一件事。他们的悲惨结局都被安排在这一战役中，他们并不曾去征辽，更不曾去平田虎、王庆。”原本这样的情节，是和《宣和遗事》里面《水浒》故事的节要相符合。”钱静方在《水浒演义考》中所说与郑说略有不同。他说：“《水浒》实元季施耐庵先生所撰，罗所编者，特征四寇之后《水浒》。”赵茗狂在《水浒传考》中对此赞同，并反驳了有人说金圣叹自称得到“贯华堂古本”是作伪，他说：金圣叹“这个人是极有胆气的，他要武断《西厢》后四折为续作，就那么的武断了，并没有提出什么古本来，那么，《水浒传》倘然真是经他大大地篡改过的话，也尽可明白说出，又何必假托一个古本呢？”“金圣叹的所谓‘贯华堂古本’，考其成书年代，大概是在明朝弘治、正德间。”佚名的《中国小说大家施耐庵传》还说：“元施耐庵，东都人也。……所著书皆不传，惟《水浒》行于世。相传成书之日，拍案大叫曰：足以亡元矣！而耐庵之心事，于此一语，跃跃然如见焉。”梅寄鹤在《一百二十回古本水浒序》中，还提到一手抄本伯绥氏《梦花馆笔谈》，其中介绍了施耐庵生平和在江阴坐馆的一些情况，这个托名伯绥氏的，其实是清末民初人、吴县的江荫香，他自称“梦花馆主”，对《水浒》有一定研究，他也肯定了施之著作权。

以上材料说明，自明初发现《水浒传》刻本以来，许多文人学者所考定的《水浒》原著者为施耐庵是可信的。当然，在施耐庵以前的很长时期中，许多民间艺人和文艺作家已经流传和创造了关于《水浒》的很多丰富的故事，在施耐庵后，又有些